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

黄 兴 涛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18世纪中英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英通使的开端。对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已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考察。比如，这次使团来华究竟是否提出过传教要求？它是怎样接受和完成东印度公司交给的关于传教士方面的任务的？在这次使华过程中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如何等等，就是如此。概括起来说，也就是英使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粗略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

本文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英国使团这次来华究竟是否提出过在华传教的要求。这同马戛尔尼是否行过三跪九叩之礼一样，目前仍然存有疑问。

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第二道敕书中明确指出，英使是提出过传教要求的，对此他曾严厉地予以驳回。敕谕说："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1]

钱宗范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认为英使曾提出这种要求。他把英使的要求归纳为8条，其中第7条赫然为："允许英国人在中国自由传教"。[2]

另外，传教士安纳(Hanna)在写给此次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英使团要求清廷"允许在帝国各省建立传教士住所(或教堂)"一条，似也可作为要求传教的证明。此信是安纳转抄另一在京传教士格拉蒙特(Grammont)写给广东的一家西班牙公司头目阿格特(Don Manuel Agoté)的信件。在此信中，格拉蒙特将英使所提要求概括为5条，其中第4条就是上述所提到的内容。这封信写的时间较早，当时英使尚未离开中国。[3]

然而，马戛尔尼本人却矢口否认有过这种要求。他在接到乾隆第二道敕书、弄清有关内容后，曾当即向护送他回国的钦差大臣松筠提出抗议。他说："其实我所开的说帖里头，只是提到商业问题，没有一字涉及传教，现在敕书中忽然节外生枝、出现此事，真令人莫名其妙。"[4]在松筠对他做出某种解释后，他还继续声辩，以表明自己的无辜。大意是说，英国人虽然同欧洲大陆上的葡萄牙等国都信仰基督教，但却不象他们那样热心于传教。西方来中国的英国人只有商人，向来没派过职业传教士就是证明。本人这次到中国来，随员里也确有一两个信教之人，但他们的职责在于管理各项礼物，并没有负传教的责任。敕书说我们意图在中国传教，实在与事实不符等等。[5]

一些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也持这种看法。

那么，究竟马戛尔尼使团有没有提出过传教要求呢？考察和分析各种记载，我倾向于后

一种意见，即认为没有提出过。除了前述马戛尔尼本人的声辨抗议外，还有以下理由可以为据。

其一，该使团没有肩负这样的使命。无论是政府还是东印度公司给使团的指令中，都没有布置这项任务。尤其是英国政府，当时甚至还缺乏这种准备。[6]马戛尔尼此行的主要使命是要在北京派驻使节，获取广州以外的新贸易口岸，改善广州通商条件等，也就是打开外交渠道，扩大对华贸易通商，在这一主要使命完成并不顺利，且已就礼仪问题同清廷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认为马戛尔尼还要提出使命之外的传教要求去火上浇油，实不符合常理。当然，这并不是说英国使节心底没有丝毫传教的心思。但有无这种心思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不仅对使团的主要使命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对清朝的严厉禁教政策也十分了解。这一点，从马戛尔尼的日记，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巴罗，安东逊等使团成员的使华笔记中，都能得到证实。他们没有必要以这种既没被国内要求，又明知清朝不会同意的问题，去影响他们主要外交使命的完成。

其二，乾隆皇帝的第一道敕书中无驳斥"传教"的内容，说明这一条即使提出，也只可能出现在马戛尔尼起程回国前夕(1793 年 10 月 3 日)托和珅转递的那封书信中。而据一般记载，这封书信的要求共有 6 条，都是关于商业方面的，并没有关于传教的条款。前述钱宗范先生的观点也未能拿出新的史料依据，似从乾隆的第二道敕书内容演绎出来；传教士格拉蒙特没有参加有关翻译工作，不了解内幕情况，他所列举的 5 条要求直接出自敕书也说不定，因此至多只具有参考价值。另外，据英国史家普里查德考证，关于格拉蒙特的上述信件，除了安纳的抄件外，还存在有勃拉姆(Van Braam)先生的另一份原始抄件。这份抄件中的第 4 条没有"传教士"(Missionnaires)一词，而代之以"商业代理人"(Commissionnaires)。因此他认为可能是安纳抄错了。[7]这确有道理。如果按照勃拉姆的抄件，此条内容应译为："允许商业代理人在帝国各省有住所。"这同英使要求在所请求各通商口岸英商有居住权利的条款基本相符。如果按安纳的抄件译成关于"传教"的内容，夹在四条商业要求之间，实在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其三，当时负责翻译乾隆第二道敕书的意大利传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94 年 9 月 29 日从北京写给马戛尔尼一封信，信中内容也表明英使没有提出传教要求。在此信中，贺清泰说，他奉命同另一个在京当差的传教士劳喀斯(Nicholas Joseph Raux)一起将这道汉文敕书译成拉丁文。一个中国官员高声念一句，他们就翻译一句。当听到英国人要求在中国传教那一句时，他们吓得目瞪口呆，赶紧向中国官员解释说，英国特使实在没有要求传教之意，但那位中国官员就叫他们译作"教会"。[8]

由此可见，认为英使没有提出过在华传教要求的观点，是基本可靠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心体会乾隆的第二道敕书，就会发现他不仅将这条置于全敕书的最后，而且在遣词和语气上也同驳回前几条要求时略有不同。在驳回前几条要求时，敕书都明言"据尔使臣称"，"又据尔使臣称"或"又据称"，惟独提到这一条时，改为"今尔国使臣之意"。这种细微的差别，对我们说明英使没有提出在华传教的要求也颇有意义。

那么，既然英国使节没有提出传教要求，乾隆的敕书又为何出现那段驳回文字呢？对此矛盾现象，大约有以下三种可能。一种是乾隆帝从以往的经验出发，做此种意测，提出驳回以防患于未然。在马戛尔尼对敕书内容提出抗议后，钦差大臣松筠最先做出这种解释。他说："这是因为向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大多喜欢传教，皇上恐怕你们英国人也有请求传教之意，故此声明在前，杜绝你们提出"。[9]松筠为皇帝的近臣，在此之前又曾负责中俄谈判的有关工作，

他对乾隆帝的心思应当说是比较了解的，因此他的解释分析，值得格外重视；第二种可能，是英国使团曾带两个澳门传教士随行北上，并正式推荐他们入京当差，而后又在北京频繁接见在京当差的各国传教士。凡此种种，引发了乾隆对传教问题的联想，以为他们有着传教意图，从而提出驳回；第三种可能，为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所揣测的："恐怕是葡萄牙教士故意挑拨中英两国的感情，在皇帝面前说英国人要在中国传教，因此当撰拟敕书时，就引教士之言以为材料。"马戛尔尼很相信自己的这种推想，以为"否则中国人对于欧洲情况向不习知，决不会作此等揣测之词的。"[10]

不过，我更愿意将以上三种可能综合起来看，认为正是以上三种可能因素的整体、至少是前两种因素的综合使用，导致了上述英使没有提出传教要求、而乾隆敕书却加以驳回的矛盾现象。

关于上述矛盾现象，也还有其他解释。如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就认为，在京当差的葡萄牙传教士为了达到能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可能在翻译英使的要求的过程中暗自添加了这一条。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就有这种想法。[11]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当时负责翻译英使要求的未必就是葡萄牙传教士，即便是，他们也绝不敢擅自加添有关传教内容，最多只能是在措辞上有所变更而已。贺清泰在给马戛尔尼的信中曾对此有过说明。他说："我们是不敢擅自删去敕书里面的整个句子的，只能在词句上的一二处略加更改，因为我们恐怕中国官员认为我们的翻译失去正确性，将会叫第三个教士来详加检查"。[12]他说的虽然是将汉文译成拉丁文及其删去句文的事，但将拉丁文译成汉文及加添内容，也可以作同一观，显然传教士的处境和心态并无二致。至于说擅添"传教"内容，以为自己的传教目的服务，就更不可能了。的确，没有谁比这些在京当差的传教士更希望能传教，但同时也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乾隆禁教态度的严厉坚决、动辄得咎。这样做似在挑拨中英关系，而不利于传教，甚至还面临着累及他们现存地位乃至生存的巨大危险。

以上，我们辨析了乾隆敕书出现驳回英使并未提出的传教要求的几种可能性。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这需要进一步发掘材料。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同乾隆皇帝对传教的敏感有直接的关系。纵观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禁教态度有一个逐渐严厉的过程。康熙较为宽容，雍正已较严厉，到乾隆时则达到顶峰。在此之前，乾隆朝已有"教难"多起，对那些蔑视法律、肆行传教的西方教士严厉打击，有的甚至下令秘密处死。1784 年底至 1786 年，在全国数省范围内还曾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查禁传教运动。乾隆谕旨明言："西洋人私至内地传教惑众，最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陕西、甘肃、湖广等省彻底查禁，"并密谕各省督抚一体遵照妥办，不可视为具文。"[13]至英使来华，时隔仅有六年，乾隆皇帝对传教的敏感性有增无减，防范也有紧无松。不过，乾隆的严厉禁教态度和措施，同康熙、雍正一样，并不取决于其自身对西方宗教的好恶，而决定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在需要。只是他本人更重视对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控制，同时，他统治后期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更加尖锐，从而促使他更加重视对"外夷奸混、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的警惕和防范罢了。这才是他对传教问题较为敏感的根由。

二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提出在华传教的要求，也没有这样的使命，但它所承受的外交任务

中，却包涵有直接关于传教士的内容。这一点，以往史家甚为忽略，特别是英国史家，常常不愿提及。其实，弄清这一问题的来龙及其完成情况，对我们更全面的认识这次英使访华还是很有必要的。

传教士是当时唯一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宫廷的西方人，对中国最为了解，成为当时西方社会认识中国的主要媒介。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当时西方无论考察什么与东方有关的问题时，都不得不首先想到他们。英国也不例外。不过这次，英国想到传教士却主要是从商业角度加以考虑的。他们虽然也看到了传教士的一般外交作用，但最重视的还是传教士与推进在华商业利益的关系。

使团筹备期间，英国国王曾通过国务大臣邓达斯写给马戛尔尼一封私人指示信，该信就明显流露出对有些欧洲国家借助传教士获得商业利益的某种羡嫉，从而表示英国必须赶紧采取外交措施、来弥补这种不足的迫切性。他写道："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多于任何其他欧洲各国。有些国家在和中国通商的前后都附有该国写致中国皇帝的正式函件。有些国家得力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由于他们的科学的专长或艺术上的天才，常常和那里的神秘而文雅的王朝发生亲密联系。他们在传教之外也为他们国家的利益有所尽力。但英国商人缺少这种帮助，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每每被人误解而得不到尊重。"[14]这次使团的副使斯当东在《纪实》一书中，也屡屡流露出英国此前没有传教士来华、无法享受其益的遗憾。他认为这些来华传教士"不但争取了皈依他们的宗教的信徒，而且也为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印象。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他们的私人干请，他们就为本国在华商人的利益服务了。"[15]

英王、邓达斯和斯当东关于传教士有助于欧洲各国对华商业利益的想法，反映了当时一般英国人，特别是那些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英国商人的普遍心理。正因为如此，东印度公司正、副主席在给马戛尔尼使团的指令中，从特有的商业眼光出发，明确下达了两项直接关于传教士的任务：一项是了解和证实"驻于北京之传教士，对于其所属之国有利与否，对于吾人亦有害与否，均请特为报导"；另一项是，假如在北京派驻使节和其他代表的要求遭到拒绝，就设法在北京安排若干传教士，"为本公司利益计，担任传达消息，并有时给予吾等管货人以助力"的任务。关于后一项，公司正、副主席还特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这些传教士最好"无任何明白之统属关系……反之，其交际方面，均由私人负责，纵使发见，亦无牵连"。同时，他们还"必须具有英法文字知识，如何选择，则意大利传教士胜于法国者。因意大利传教士与其本国人既无商业关系，而其使命与吾人抱持者并无不合之处，而费用非奢。"最后叮嘱马戛尔尼："此事于当地情形，所关极大，惟望阁下考虑而行。"[16]其思虑可谓周详备致。这种企图利用他国在京传教士充当英国商业奸细的不光彩的指令，彻底暴露了东印度公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实质。[17]

东印度公司是这次英使访华活动经费的提供者。它的指示理所当然成为使团的使命。这种使命远不止以上两条，此外还包括搜集各种商业情报等内容。

由于使用了东印度公司的经费，并从那儿领取高额的个人薪金，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始终未敢或忘公司所布置的任务，而是想方设法予以完成。在首次给东印度公司正、副主席的报告中，马戛尔尼公开表示："执行公等之训令实为吾目中之先务"。[18]别的暂且不提，他们将公司所布置的两个关于传教士的任务，就确实放在了"先务"的位置上。几乎一到广东，他们就着手了有关工作。带两个传教士入京当差，便是他们完成其中第二项任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当

然，促使他们如此早地就考虑从事这项工作，有偶然的因素。副使斯当东到澳门办理有关先头事宜时，接触到一些传教士，其中正好有两名通晓天文和数学的欧洲传教士安纳(Hanna)和拉弥额特(Lamiot)，迫切希望进京当差，因苦于澳门葡萄牙当局的多方阻绕，一直未能如愿。这次遇到英使进京，便要求带上他们一同前往。考虑到他们二人确有真才实学，皇上一定会安排他们在钦天监工作，而他们一旦如愿，又必然会感激英国，乐于为英国效劳，所以英使欣然答应让他们上了船。

可事情在此之后却变得复杂了。当他们随船到达天津白河口之后，马戛尔尼又突然让他们乘船返回澳门。此中情由，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说法不一。斯当东说，这是由于传教士"不是使节团的成员，在船只返回广州之前，没有得到护照，不能进北京"。[30]马戛尔在日记中则表示："我们不想他们随同使节团同行。如果他们随同往北京，北京当局就会以为他们也是使节团的成员了"。[31]但不管怎么说，马戛尔尼直到此时才意识到不能让传教士随行，以免影响外交使命，绝不会只是他自己的灵机一动，或者纯粹是作贼心虚。假如不是斯当东所说的原因，恐怕也和清朝官员徵瑞对使团成员的人数、身分等情况的详细核查有关(徵瑞曾奉有此令)。而这又是马戛尔尼起先所没有料到的。

马戛尔尼让传教士乘船返回一事，清廷并不知晓。也许是他行事悄然，徵瑞等钦差并不知情；也许是他得知不允、没有过分坚持，徵瑞等不愿多事，也没加奏报。实情不得而知。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使团到达热河谒见乾隆之后，马戛尔尼又将此事以书信的形式，向清廷正式提了出来。这封书信是通过和珅转呈的。内容除此之外，还包括允许马金托什船长返回舟山，负责照管船只，允许"印度斯坦"号船在舟山贸易等要求。关于请求允许传教士入京当差一事，马戛尔尼的日记所记载的书信内容是这样的："我东来之时，同船有精于算学的欧洲人二人，拟请贵国大皇帝酌予录用，该二人曾同至大沽，现尚在'印度斯坦'号中，倘蒙中堂俯允该船长回船，可否特可恩典，另派一位欧洲传教士和他同行(如可能的话)，使该教士可以带那两个欧人同往北京"。[32]但在军机处的奏片和皇帝的谕旨中，所提此事则有所不同。后者表明，马戛尔尼仅要求派一名传教士作为"通事"陪同马金托什前往，并未提到要让此教士带安纳和拉弥额特回京，恰恰相反，他们的要求是让两名传教士"令吗嘆哆噺(即马戛尔尼——引者)带至京城"。[33]这种差别并非无关紧要。本来清廷对他们直到此时才通报随带传教士入京的情况就颇有不快，而他们又表现出包办此事的热心，由此更增加了清廷的戒备之心，认为他们心怀叵测。军机处奏片指出："安纳等二名学习天文，要到京城当差，自可准行。但该使等既令附船随行，在天津时自应即将此情节禀明伴随官员，转回中堂大人们奏准，即可令安纳在天津进京。伊等彼时既不禀明，致令随船回至浙江省，今又徒劳跋涉，殊属无谓。今安纳进京，亦不必用该国人带领。祇须令该贡使等写一信字呈出，一并由驿交给浙江巡抚传知安纳等"，然后按照他们本人的意愿，从浙江或回到广东，由该省派人护送来京均可。[34]徵瑞传谕给马戛尔尼时，语气更为严厉，通令此事"该使不必越俎代庖"。[35]这下，马戛尔尼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为开脱嫌疑，他赶忙表示："皇帝既准其来京，祇须传知伊二人遵照前来，我们亦不必寄信与他，"[36]希图挽回不利影响。然而乾隆的疑心仍然未能打消。在英国使团返回途中，他还谕知钦差松筠，"搭赴夷船，情愿进京当差之安纳，拉弥额特二名，是否真系佛兰西人，抑系英吉利国人假托混入，……著长麟确切查访，据实具奏，再行送京。"[37]

最后，几经周折，安纳和拉弥额特终于在1794年3月，正式奉命入京供职于钦天监。英国使节的心愿总算得以实现。从此，北京城内多了两个英国可以信赖和依托的传教士；而他

们也不负厚望，积极为英国提供信息和情报。[28]

除了颇费周折地安插安纳和拉弥额特两人外，马戛尔尼在华还广泛地寻觅、选择为己服务的传教士。特别是到北京后，他避开清廷的种种阻绕，同在京当差的各国传教士多方接触，一方面通过他们尽量了解有关朝廷的各种情报，请求他们为使团服务，以应付于眼前；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建立持久的联系打下基础。

马戛尔尼的这些活动都是早有预谋的。还在出使之前，他在礼品建议中就提出：要对北京的各国传教士赠送一些欧洲制品，以有助于赢得他们的好感。㉚这个建议被采纳。同时，他们还预先获得意大利安托内衣红衣主教和有关方面写给北京传教士的几封信，要求他们协助英国使臣工作。据斯当东说，马戛尔尼一到北京，就向中国方面请求同在京当差的各国传教士见面。通过这些信、礼物和他的“多方努力”，整个北京当差的传教士绝大部分都来拜访过他。[31]其所寄托的希望和他本人的活动能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些传教士之中，为英使做的工作最多，被认为最为友好的主要有五人，他们是意大利传教士贺清泰，德天赐(Adeodato)，法国传教士劳喀斯，格拉蒙特和安密特(Père Amiot)。其中前四人，马戛尔尼回国前夕，曾赠送他们每人一块金表，[32] 希望能与他们保持联系。他们也都表示非常乐意为英国效劳。在这四人里面，英使最看重的又是劳喀斯和贺清泰。斯当东回至广东时，还专门写给劳喀斯一封信，特意将归途中中国大员对英使的良好态度和会谈成果告诉他和贺清泰，并表示英国不久还会再派使团来中国，以激励他们的友好合作。[33]英使回国后，贺清泰、劳喀斯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都分别有通信联系。[34]德天赐也经常给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提供情报。1803 年，他因私自派人传信和地图到广州被发现，导致牵连颇广的“德天赐案”。嘉庆时他被驱逐出宫，但到澳门后却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优礼款待”。[35]可见他同英国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通过与教士的广泛接触，马戛尔尼对东印度公司所布置的关于传教士的第一个任务，也有了交待。他汇报说：“吾此行匆匆所得之中国情报，如有不足之处，尚可补救，吾相信有时可藉在北京及中国之欧洲传教士及各省与吾使团中主要人物相熟之传教士之助而行之，吾人可由旅行者来华之便，与彼等时时通讯，盖现无正常公开为个人而设之邮政也。惟有此法，传教士方能效力于公司，且不致牵连公司或管货人。关于此事，传教士曾立有功绩，但亦必有为其本国利益而服务者。闻葡萄牙传教士今尚如此。倘与英国方面通讯，表面上作亲善或科学上之谈论，而供给他种之情报，未尝无用也。”[36]

此中所谓“与吾使团中主要人物相熟之传教士”，实际上就是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华笼络和结交之人。他所建议采取服务于公司的“通讯”方式及其具体做法，也可以说正是他们使华期间从事这项活动的经验总结。这一点反过来还可证明，他们在华所开展的有关传教士的工作，乃是他们完成东印度公司指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所以不择手段，结交传教士，目的也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服务于商业利益。它集中反映了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对华通商的迫切心情。虽然，作为英国国王所派的堂堂使节，做出上述活动和提出那种不光彩的建议，不免有失身份和尊严，但从中我们却可看到英国政府那种极端务实的外交作风，这同当时清王朝一味偏执嗑头礼仪，只重面子的务虚态度，恰成鲜明的历史对照。

三

马戛尔尼使团承担了两项关于传教士的任务，并为之进行了努力。同时，传教士也以其

特有的专长和双重的身分，卷入到这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中。如果我们把这次使华活动比作一出历史剧，那么，传教士可以说充当了不可缺少的配角。正是在他们的参与和影响下，这出历史剧才得以开演，得以演成如此的场面。

首先，传教士的加入，直接促成了英国使团的最后组成和筹备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其作为使团的中文秘书，起到了别的成员所无发替代的作用。

据斯当东记述，英国使团组建之初，“有一个绝对必要的，但难以物色人选的职务，那就是中文翻译。在英国全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37]为此，他不得不奉命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教会，专程去寻找这样的人选。后来在意大利教廷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两个传教士，使团这才得以成行。有趣的是，这两个传教士竟然都是中国人。他们一个叫李雅各(即柏仑白)，另一个叫卓保罗，原从中国送到罗马教廷所属的那不勒斯学院进修神学，这次教会正好趁此机会派他们回国传教。他们到英国之后，为使团的准备工作尽力提供了帮助。斯当东恬当地评价说：“这两个中国人，根据他们对本国事务的了解，对使节团的准备工作做了有益的建议。首先是在按照东方方式选定赠选中国皇帝及其大臣们的礼品上，他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另外他们也提出了在广州需要最大、获利最高的货品种类”。[38]那些到中国发挥了用场、为中国官员所醉心的“八音匣”就是使团根据他们的建议特意准备的。他们还为使团精心翻译了众多的礼品说明单。在来华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又为使团成员进行了有关中国知识的启蒙，还给其中两人系统教授中文。那个曾受到乾隆喜受、并为使团抄写了不少中文文书的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就是他们的速成学生。

到达广东后，卓保罗因为害怕公开替洋人办事，中途退出了使团。不过使团在华期间，他仍然帮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东代表给马戛尔尼送过一封信。这封信及时地传达了英法将发生军事冲突的信息，对马戛尔尼适时地做出辞行回国的决定，起了一定促进作用。[39]

李雅各则一直忠实地担任使团的中文秘书。在来华不久、到承德之前那段时间里，使团几乎事事都得仰仗他。清朝官员的奏折和清廷谕旨中，也常常出现“据英咭利通事禀称”等字样。那时他不仅做翻译，还经常奉命同中国官员直接打交道，提出英国使团的各种行动要求。在承德时，他甚至还冒着风险，为使团递送过一封重要信件给和珅。这封信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包含有请求随行两个传教士进京当差内容的那封。当时，英使认为钦差大臣徵瑞不友好，担心他接信后不及时奏报，压在手里，故而决定把信直接交给和珅。可是，“使节团的中国仆人中没有一个人敢不得他(指徵瑞)的允许私自带信出去，又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单独走进和中堂寓所，闯进去同他见面”，[40] 英使为此颇为发愁。最后还是李雅各自告奋勇，穿上英国服装，完成了这一任务。据说，一路上，他曾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阻挡和围攻。[41] 访华结束后，他留在了中国传教。

其次，在京当差的传教士，为英国使团做了不少实际工作；供给了一些有用的中国情报；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被英使采纳的建议。其中有些做法和建议，对维持和改善中英关系不无积极效果。

使团来华后，乾隆谕令以钦天监监副索德超(Bernard de Almeyda)为首的西洋当差传教士，到热河和在京参加有关接待事宜。有些擅长修理钟表机械的传教士，则从所在各堂奉命到圆明园协助使团技师安装大量的礼品仪器。为示优待和郑重其事，乾隆还特地赏加索德超三品顶戴，贺清泰、劳喀斯、德天赐等人六品顶戴。从而为他们影响使团提供了直接的机会和便利条件。

劳咯斯就是在奉命到使团服务的过程中，为使团做了大量工作的。英使那份提出磕头条件（要求一位同马戛尔尼地位相当的中国官员在英王御像前行同样的磕头礼）的汉文文书，就是他代为起草。当时，情况十分微妙而紧迫。徵瑞志在使英使屈服，李雅各又无能为力（汉文既生疏，又不熟悉官方文书格式），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则坚持认为，"这个条件非常重要，为了避免由于误解而发生不利影响，必须把它最正确地译成中文。"[43]无奈，马戛尔尼只好求助于劳咯斯。由于这种事超越了清廷所规定的服务范围，他不得不"花了很大功夫"加以劝说，最终劳咯斯同意并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

马戛尔还从劳咯斯那里了解到不少宫廷的内幕，朝中的实权派情况，乃至京城的防御组织等情报。正如他自己所记述的："有许多我不能从王、乔两大人（当时清廷所派的接待大臣）口中得知的事，或语焉不详的，现在由劳咯斯神父一一告诉我了"。[44]后来，劳咯斯奉命同贺清泰一起将乾隆给英王的敕书译成拉丁文，在翻译过程中，他又有意识地弱化了敕书中那种以上对下的傲慢语气和措辞。这种做法同马戛尔尼不愿磕头一样，被认为是维护了英国国王的尊严。英国学者普里查德就将此列为使团与传教士联系的必要性的一个证据。[45]

格拉蒙特是另一个积极为英使效劳的传教士，不过他主要以秘密通信的方式为使团服务。使团来华期间，他曾先后给马戛尔尼写过五封密信，提供了清廷对使团的态度、有关人事安排等情报和一些建议。在写于 1793 年 8 月 6 日的信中，他向马戛尔尼透露：清廷可能派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给使团担任翻译，此人对英国很不友好，将对使团的使命加以破坏。马戛尔尼听信了他的话，一直对索德超加以提防，还巧妙地拒绝了让此人担任翻译之职[46]；在写于同年 8 月 30 日的一封信中，他又开列了一批可能影响皇帝对英态度的权臣和贵戚名单，建议使团加以贿赂，马戛尔尼也当即加以采纳。他于 9 月 1 日从马金托什船长那专门购来价值 2399 英镑的礼品，决定按格拉蒙特所列名单予以分发。[47]后来作为私人礼物送给乾隆的两块精美表，就是从这些礼物中选送的。其中，送给和珅及其他阁老的礼品，不知何故被退了回来。[48]

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密特。他是一个老资格的传教士，这次英使访华过程中，也十分热心于效劳使团，既写信又拜访，成为马戛尔尼的一位"私人朋友"（斯当东语）。马戛尔尼自己承认："这位神父一向就很关心我们的使节团，曾供给我们许多有关中国的情报，以备参考"。[49]特别是他最后一次的拜访和一封长信，对使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793 年 9 月底，乾隆已有让英使归国之意，10 月初，和珅向英国使节委婉地传达了这一意思，但马戛尔尼等人却没能听出其真意所在，他们打算"耐心地等下去，能多留一天就多留一天，希望局面能变得好一点"，起码要等在中国过了春节再走。[50]听了安密特的建议后，他们才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马上辞行回国。

安密特告诫马戛尔尼：跟中国人打交道，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这次访华已得到皇帝接见，打开了中英交往的大门。以后英王要不断同中国皇帝通信，争取逐渐扩大这种交往。同时应正式任命一个在华英侨负责主持递信等事宜，经常与地方官联络感情，解决有关中英外交事务，这样久而久之便成为惯例。此人无形中就是代表英国国王陛下，英国虽无常驻公使在华，却可收常驻公使之实，事之两全，再好不过。[51]这个建议，对于英国欲实现的目标来说，确实不愧为深知中国的中的之论。马戛尔尼对此论甚是钦服，回国后便促使英王给乾隆写了一封表示感谢和愿意继续友好的信件。多年后，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一职，也可视为这一建议的实施。

由此出发，安密特还奉劝马戛尔尼应马上辞请回国、不可拖延。他说："日下中国政府不愿特使久留，特使就应该早日向朝廷辞行，准备回国，不要使中国人下逐客之令，见之明文，以后的事就更难着手了。"[52]对此建议，马戛尔尼也心领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安密特神父这番话，是经验之谈，值得珍视。我意已决，立即写一信给和中堂，……辞请回国。"[53]虽然，促使马戛尔尼决定提前回国的还有其他因素，象前文所提到的关于英法将要开战的信息等，但安密特的这一劝告，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马戛尔尼适时地做出了辞行回国的决定，避免了中英关系破裂的危险，至少避免了一场因英使久留不走而必然造成的中英冲突。其后，马戛尔尼能同钦差松筠友好相处，同长麟交谈并获得改善广州贸易的各种允诺，收集到更多的商业情报，乃至赢得中方允许继续通好的表示，都直接缘此而来。

实际上，以上所提到的几点，正是马戛尔尼使华在实现总体目标失败的前提下难得的几点收获所在。这种收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传教士所提供的帮助。仅仅是马戛尔尼本人娴熟的外交技巧，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以上，我们谈到了传教士对于英使访华所提供的帮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尽管是主要方面。在华传教士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都希望英国使团能顺利地完成所赋使命，其中，以索德超为代表的葡萄牙传教士，就是一支不利于英国使团的力量，他们出于维持对本国在华优越地位的心理，不愿看到日渐强盛的英国对华关系的加深和利益的扩大，因而对使团访华采取了捣乱态度，起到了某些消极作用。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后，马戛尔尼不断从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传教士那里听到关于葡萄牙传教士对英国不友好的密报。他本人也因此加强了对于索德超其人的观察和防范。

结合各种密报和自己有心的观察，马戛尔尼认为，索德超其人"妒忌心很重，凡到中国的欧洲人，除其本国人之外无不加以仇视，其对英国人的嫉视尤甚"；[54]"此人很是阴险沉鸷"，对英国使节的态度"嚣张厉色"，"只看他的眉目口舌，便知道他有恶意"。[55]还声称："根据我的观察，葡萄牙人已结成一阵线，排斥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除他们葡萄牙人外，都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占有便宜。可见葡萄牙人嫉忌外国人的程度已至极点了"。[56]这种观点虽不免有些成见，但索德超对英国使团不友好、且有过不利于使团的干扰行为却大抵属实。据马戛尔尼日记记述，索德超奉命前来协助中国官员接待使团时，曾以拉丁语向近座的意大利传教士尽情地议论英国人之短，结果被懂拉丁语的马戛尔尼全部听见；在使节前往热河觐见皇帝之前，他还曾故意阻止马戛尔尼向徵瑞提出的先移居北京城的要求。[57]对于他的不友好态度和行为，甚至连在一旁的其他传教士也看不过，奉劝他不可"过于失礼"。[58]

另外，乾隆担心英国可能出现垄断贸易或冒然侵略的举动，制定了"抚夷制英"的送使方针，在这背后，也不能排除索德超等人暗中作用的可能。有趣而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所谕定的"抚夷制英"的方法中，竟有一条是联络澳门的宗教势力："闻澳门有西洋尼僧，在彼焚修，各夷商俱极信奉，遇事听其指挥剖断，未知英咭利夷人是否信奉，如此尼僧，向不与英吉利一气交结，可将以上晓谕夷商各情节，亦使之闻之，令其暗中作主，若此夷尼系与英吉利通同一气者，即不必告知，恐转有泄漏。"[59]而早在英使来华途中，军机处大臣们就通过索德超等传教士了解到"该国与西洋向不同教，亦无往来"[60]等情况，并向乾隆奏报。这两者之间似不无关联。

在此之后，索德超对英国的敌对态度并无变化，反而有所加强。19世纪初年，葡萄牙在

英葡战争中失败，和约条款中有将其海外某些殖民地让给英国的条款。索德超担心祖国失去澳门、于是拟一条陈密奏中国政府，略言英吉利乃虎狼之国，日夕以扩大海外殖民地为务，中国如把澳门让给英吉利，它便会以此为据点，逐渐地变中国为属国。结果被认为所奏不实，干予朝政，受到严厉斥革。[61]这件事，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索德超与英使访华的关系。

不过，对于索德超等葡萄牙传教士 所起到的消极作用，却不能过于夸大。法国传教士格拉蒙特在使团访华刚刚结束时总结其失败教训，曾有一个流传颇广的观点认为，索德超为首的葡萄牙传教士背后搞鬼，从中作梗，散布了许多不利于英国使团的言论，成为导致使华失败的主要原因。[62]这一观点显然就夸大其辞，不足为信。从索德超等人在华的客卿身分和清廷可能受其影响的程度、乃至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们对英使访华的消极作用当是很为有限的，甚至远不能同他们所提供的帮助相比。马戛尔尼使华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乾隆时代所奉行的相对稳定的对外"限关自守"政策。这一点既不以马戛尔尼等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也不是在华传教士的帮助抑或阻碍所能决定的。

以上，我们围绕着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的关系线，大体探讨了英使是否提出过传教要求，它怎样接受和完成有关传教士的任务，以及传教士在这次使华过程中的作用三个问题。但愿这种探讨，对人们更准确地认识此次英使访华的真正动机、和使团在华的历史际遇有所帮助。

---

①见萧致治、杨卫东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 256 页。

②见钱宗范：《乾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5 页。

③⑦；⑧⑫；㉘；㉜；㉝；㉞；㊺；㊼；62普里查德(Pritchard)编：《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北京传教士的来函》)，见《通报》(T'oung Pao)1934 年，第 31 卷，第 31－36 页；39－43 页；31－39 页和 45－55 页；39 页；40 页；39－45 页；56 页；20 页；31－39 页。

④⑤⑨⑩；㉑；㉒；㉕；㉟；㊸；㊹；㊾51；52 53；54 55；56《马戛尔尼的日记》，见秦仲龢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55－256 页；10 页；203 页；206 页；79 页；94 页；97 页；232 页；233 页；80－81 页；101 页。

⑥1807 年第一个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奉教会之命来华传教时，英国政府的态度就很是消极，最后还是美国政府给予了积极帮助。

⑪；㉚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第 313 页；180 页。

⑬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下)，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231 页。

⑭；⑮；⑲；⑳；㉛；㊲；㊳；㊴；㊵㊶；㊷；㊽50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 39－40 页；18 页；275 页；275－276 页；321－322 页和 332 页；35 页；37 页；411－412 页；374 页；321 页；410 页。

⑯；⑱；㊱朱杰勤译：《英东印度公司与来华大使马卡特尼通讯录》，见《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07－208 页；211 页；219 页。注㊱中引文下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

⑰普里查德的名著《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中英早期关系的严峻年代》)第 307－311 页中论述使团的使命时，关于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所赋予的各种使命都提到了，却唯独不提关于传教士的两条。

(下转第 16 页)

①⑬档案《乾隆朱批奏折、外交类》。

②③⑨⑯⑲《掌故丛编》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31页；41页；53页；53页；67页。

④⑤⑥⑦⑩㉑㉖㉗㉚(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19－321页；325页；357页；355页；359页；408页；318－319页；321页；273页。

⑧⑮⑱⑳㉓㉙卷1434－卷1435。

⑪(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801－820页载：刘复译《乾隆英使觐见记》。关于觐见礼节问题，笔者倾向于英人的记载。

⑫《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

⑭(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64页；(英)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26页。

⑰(英)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26页。

㉒秦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31页。

㉔《清史稿》卷82。

㉕《礼记、礼运》。

㉘《中庸章句》，第31章。

(上接第26页)

㉓㉔；㉖；㉙；㊾；㊿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27页；729页；730页；752页；616页。

㉗《清实录(乾隆朝)》，第21334－21335页。

㊻见秦仲龢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81－82页，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22页。该信原文见普里查德编《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北京传教士的来函》，《通报》1934年，第31卷，第8－24页。

61此事曾刊于1803年北京的邸报中。参见使团成员巴罗(Barrow)：《Travels in China》(《中国行记》)，1806年伦敦版，第19－20页。

63贺清泰在给马戛尔尼的信中甚至认为索德超对英国并非十分不友好，格拉蒙特的指责不过是妒忌而已。见《通报》1934年，第31卷，第40－43页。